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美] 劳伦·勃兰特 托马斯·罗斯基 编
方颖 赵扬 等译

伟大的 中国经济转型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CAMBRIDGE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美] 劳伦·勃兰特 托马斯·罗斯基 编

方颖 赵扬 等译

伟大的 中国经济转型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美)勃兰特,(美)罗斯基
编;方颖等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 - 7 - 5432 - 1672 - 3

I. 伟… II. ①勃…②罗…③方… III. 经济体制改革-
研究-中国 IV. 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7388 号

责任编辑 钱 敏

美术编辑 路 静

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

[美]劳伦·勃兰特

托马斯·罗斯基 编

方颖 赵扬 等译

出 版

格致出版社
世纪出版集团 www.hibooks.cn
www.ewen.cc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4层)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48
插 页 2
字 数 876,000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32 - 1672 - 3/F · 218
定 价 86.00 元

译者的话

中国的改革如同巨龙腾飞。而今,这条巨龙已经腾飞了 30 年,并开始在世界经济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早在千禧年来临之际,两位著名的中国经济专家勃兰特(Loren Brandt)教授和罗斯基(Thomas G. Rawski)教授就受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鼓舞,着手编撰一部“工具书”式的手册,旨在全面讨论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去、现在与未来。勃兰特教授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系经济学教授,曾在《政治经济学杂志》等一流国际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不少关于中国经济的文章,对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多有涉猎。罗斯基教授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和经济史教授,曾在《美国经济评论》和《政治经济学杂志》等期刊上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经济史和中国工业经济的论文,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1979)和《战前中国经济增长》(1989)等书的作者。两位教授都是北美著名的中国经济研究专家,都能独立阅读中文文献,几乎每年都会利用暑假的机会在中国实地考察。

为了本书的编撰,两位教授亲自拟定了提纲和框架,并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参与撰写。本书作者几乎囊括了北美所有著名的中国经济专家和学者,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非华裔的著名的中国经济专家,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Franklin Allen 教授、布朗大学的 Vernon Henderson 教授、布兰代斯大学的 Garry Jefferson 教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 Nicholas R. Lardy 教授、马里兰大学的 Peter Murrell 教授、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 Barry Naughton 教授、哈佛大学的 Dwight H. Perkins 教授和密歇根大学的 Jan Svejnar 教授等著名国际学者;第二类是活跃于北美学界的华裔经济学家,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的 Yasheng Huang 教授、南加州大学的 Jihong Liu 教授、波士顿学院的 Jun Qian 教授、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 Feng Wang 教授以及多伦多大学的 Xiaodong Zhu 教授等;第三类则是目前供职于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教授、中国科学院的黄季焜教授以及北京大学

的赵耀辉教授等。更具特色的是,绝大部分篇章的撰写都采取了非华裔学者和华裔学者相结合的方式。在各位专家完成初稿以后,勃兰特教授和罗斯基教授共同组织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讨论会,分别在多伦多大学和匹兹堡大学举行。会议中,每篇报告都得到了充分的讨论,并在讨论的基础上几经修改,最终在2008年年初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试图对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历程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总结。全书共有20章,每一章选择了一个具体视角分析改革的过程,可独立于其他章节。本书第1章至第4章分别从历史、发展经济学、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转型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国经济改革进行了理论阐述。第5章至第16章分别从各个经济专题的角度详细阐释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第17章至第19章则分别从部门结构、收入差距和地区差异角度论述了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结构性问题。第20章则是对未来(截至202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展望。

总的来说,本书内容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内容翔实。本书既是对中国改革这一宏伟历史事件的全景式回顾,也是对各领域具体改革过程的工笔式刻画。全书涵盖了中国改革的各个方面,涉及的论题极为广泛,包括政治、劳动、人口、环境、资源、教育、科技、工业、农业、财政、金融,结构转型、全球化、法制建设、收入差距、地区差异等等,几无遗漏。同时,本书各章的论述均甚为深入,所征引的文献和数据丰富而严谨。不仅如此,本书还将中国经济置于全球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探讨了中国经济改革对发展经济学的意义。因此,本书可说是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改革所涉及问题最为详尽的一本专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Gerard Roland教授就盛赞此书“在未来许多年中将成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地位的最重要的参考书”。

其二,注重实证。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如同巨龙腾飞,那么一百个经济学家眼中就有一百条不同的中国龙。和大多数关于中国改革的畅销书不同,本书并非是作者主观价值的倾泻,而是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虽然本书的作者并不掩饰他们对中国改革巨大成功的由衷赞叹(这从本书的标题即可看出),但也表达出他们对中国改革的一些负面问题的担忧和批评。本书各章毫无例外都是对中国改革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各章作者注重的是利用数据和其他资料来展示改革的真实过程,并归纳出改革历程的逻辑发展主线。由于中国的统计工作尚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关于中国改革的数据资料未免粗糙,这方面的争论也从未停息。对学者而言,如欲细致入微地刻

画中国经济改革这条真龙,有时无异于盲人摸象。所幸本书各章作者均在各自领域中浸淫有年,对中国数据有着深入了解和研究。因此,在目前所见的对中国改革问题的众多阐述中,本书可能是最为准确也最为接近真实的一项研究。

其三,理论扎实。本书各章作者均有现代经济学扎实的理论基础,因此对中国改革的描述并非简单的数据陈列和资料堆积,而是试图提供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各章作者对所论述的专题均有独到见解,为读者从浩繁的经济现象中归纳出中国改革的逻辑主线。因此,本书不仅是关于中国改革的经济史学著作,更是经济学著作。各章基本都代表了国际上经济学界对该专题领域的研究前沿。在此意义上说,本书乃是到目前为止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最为成功的例证,亦是中国经济改革这一命题纳入现代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成功尝试。除此之外,本书各章也提供了各相关领域最详尽的文献索引,这无疑为其他学者的未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本书的翻译团队由一群热心的青年经济学者组成,他们主要包括上海财经大学的丁晓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樊潇彦博士、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WISE)的方颖博士、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张西小姐和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WISE)的赵扬博士等。其中,方颖博士和张西小姐也参与了在匹兹堡大学召开的研讨会的会议组织工作。翻译的具体分工如下:第1、2、11、17和19章由丁晓钦翻译,第3章由方颖翻译,第4章由赵扬翻译,第5章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沈可翻译,第6、7和18章由张西翻译,第8章由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薛森翻译,第9章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曹莹翻译,第10章由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吴相波翻译,第12章由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刘长江翻译,第13章由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王楠翻译,第14章由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郭辉铭翻译,第15章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高虹翻译,第16章由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李倩翻译,第20章由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陈伟翻译。樊潇彦校对了第9章和第15章,方颖校对了第16章,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纪衍校对了第8、12和13章,李倩校对了第10章和第20章。此外,纪衍翻译了中文版序言,陈伟对全部文稿进行了初步编辑。方颖和赵扬承担了翻译团队的组织 and 协调工作,并通校了全部文稿。除明显错误外,为了尊重其他译者的工作,我们基本上保持了译稿的原貌。

同时,我们还必须感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格致出版社何元龙社长和麻俊生主任的支持和鼓励。当方颖向何社长推荐翻译此书时,何先生以最快的速度与作者及出版方联系,使本书的中文版得以在中国经济改革3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面世。当然,本书卷帙浩大,英文原版多达900余页。在较短的时间内翻译90余万字的篇幅,限于我们的水平,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待再版时有所提高。此外,译者未必同意书中的全部观点,因为其中大部分代表了西方学术界的看法,希望读者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能秉持独立思考的精神。

方颖 赵扬

于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2009年9月

中文版序言

中国经济的腾飞已经持续了近40年,众多经济学家们为此感到喜忧参半。令人感到万分欣喜的是,中国的改革使全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然而,边际学派之父、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马歇尔曾言:“自然不会创造飞跃。”这话令世人深感发展与挑战并存。20世纪,以中国为首的亚洲经济迅猛增长,并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这一现象令马歇尔的言说濒临崩溃的边缘。

作为潜心研究中国经济史和经济增长的学者,我们在千禧年之际萌发了编纂此书的构想,旨在全面系统地记录中国经济的巨大变革。我们邀请到了各个领域最出类拔萃的专家学者组成研究小组,从多维度审视中国经济。此书编纂历经八载,乃是笔者的倾力之作。书中探究了近年来中国经济腾飞的渊源,描述分析了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关注有可能阻碍中国屹立于世界经济强国之林的不利因素。个中是非,留待读者评说。

值此中国改革30年之际,欣闻该书中文版问世,我们感到不胜荣幸。该书中文版之所以能如此之快地面世,得益于格致出版社何元龙社长和麻俊生主任的热忱帮助,同时也离不开丁晓钦、樊潇彦、方颖、赵扬和张西等人组成的翻译小组的通力合作。我们对所有这些人在此书成书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不胜感激。

劳伦·勃兰特
托马斯·罗斯基
2008年7月

参编者

Franklin Alle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ere Behrma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Dwayne Benjamin
University of Toronto

Richard M. Bird
University of Toronto

Loren Brand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ee Branstetter
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

Kimberly Burnett
University of Hawaii and University of Puget Sound

Fang Ca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Kam Wing Cha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Donald Clark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School

John Giles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Stephan Hagga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San Diego

Emily Hannu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 Vernon Henderson
Brown University

Alan Hest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Chang – tai Hsie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Berkeley

Albert G. Z. Hu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Jikun Huang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Yasheng Huang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Gary H. Jefferson
Brandeis University

Nicholas R. Lardy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Jihong Liu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Andrew Mason
University of Hawaii

Peter Murrell
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rry Naught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San Diego

Keijiro Otsuka
Foundation for Advanced Studies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lbert Park
Oxford University

Dwight H. Perkins
Harvard University

Jun Qian
Boston College

Meijun Qi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Thomas G. Rawski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James Roumasset
University of Hawaii

Scott Rozelle
Stanford University

Terry Sicular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John Sutt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Jan Svejna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Kai Yuen Tsui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ANG Fe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Irvine

Hua Wang
World Bank

Meiyan Wa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angui Wang
Renmin University

Christine P. W. Wong
Oxford University

Susan Whiting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Yaohui Zhao
Peking University

Xiaodong Zhu
University of Toronto

目 录

1	1 中国的经济大转型
21	2 中国与发展经济学
56	3 中国的转型表现——一个与其他转型 经济比较的角度
77	4 中国转型过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14	5 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因素
140	6 改革中的中国劳动力市场
182	7 改革时期的教育
212	8 环境资源与经济增长
245	9 中国的科学与技术
290	10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录 目

319	11 法律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362	12 中国的财政体系:进行中的工作
395	13 中国农业的发展——历史的教训、 近年的成就、未来的挑战
430	14 中国的金融体系:过去、现在和未来
484	15 中国的工业发展
540	16 拥抱全球化
584	17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
624	18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收入不平等
665	19 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因素
704	20 预测 2025 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长

1

中国的经济大转型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G. Rawski

在本书中,许多领域的研究者集思广益,对中国大规模、持久且出人意料的经济腾飞予以总结评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持续了30年。20世纪末,在东亚邻国经济惊人增长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仍显得异军突起。

在中国经济全面增长之初,收入和消费水平相当低,经济发展在地理上的扩展及其速度和持久性表现显著。沿海地区率先在生产、出口和收入上取得进展,中西部地区也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效益。

简单的概述就能展示最近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仔细回顾一下现有数据会发现,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改革前的4%增加到1978—2005年的9.5%(见第20章)。Young(2003)和其他一些学者把最近的发展归于粗放型经济,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来自劳动力和资本在生产中投入的增加。同样的研究也表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每年的0.5%上升到改革后的3.8%,在GDP中的百分比由1957—1978年的-13.4%、1952—1978年的11.4%上升到1978—2005年的40.1%。

表1.1和1.2使用了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s)和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数据,来对比中国和其他几个国家总体GDP和人均GDP的趋势。1978年以前,中国总产量比美国和印度的GDP的增长更快,但远远落后于日本。1978年后,中国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成为了正常现象,这促使了中国的总产量由占日本1978年GDP的37.5%上升到2004年的219.2%,等等。见表1.1。

表1.2也显示出人均GDP有类似趋势。改革前,和印度、美国相比,中国经济有些许的赢利,但远落后于日本和韩国。1978年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人均GDP和韩国相比翻了一番,甚至比印度、日本和美国增长都要快。

表 1.1 中国 GDP 占其他大国 GDP 的百分数,1978—2004 年^a

	1952	1978	1990	2000	2004
美 国	9.5	13.6	27.9	51.7	64.0
日 本	78.5	37.5	70.5	165.9	219.2
德 国	n. a.	50.8	113.3	244.8	322.1
印 度	63.9	78.0	122.2	190.6	203.1 ^b

注:a.以购买力平价计算。b.依据 2003 年的数据。

资料来源:Heston, Summers 和 Aten(2006)。

表 1.2 中国人均 GDP 占其他国家 GDP 的百分数,1952—2005 年^{a, b}

	1952	1978	1990	2000	2004
美 国	2.7	3.2	6.3	11.6	15.7
日 本	11.8	4.6	7.7	16.7	21.3
韩 国	25.4 ^c	15.0	16.4	25.5	30.1
印 度	42.6	53.7	90.3	151.4	188.5

注:a.以购买力平价计算。b.每个对比国家的平均数是 100。c.数据指的是 1953 年。

资料来源:2005 年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以现值的国际美元计算的数据;早些年数据来自 Heston, Summers 和 Aten(2006)。

人均产量的快速增长使成百万的人脱离了绝对贫困。Ravallion 和 Chen(2004)的报道表明,在中国农村,绝对贫困的人数巨减:他们使用了官方的早期贫困数据,农村贫困人数的百分比从 1980 年的 40.65%下降到 1990 年的 10.55%和 2001 年的 4.75%。第二项数据表明,绝对贫困人口比例相对较高,1980 年占总人口的 75.7%,2001 年占 12.49%。

中国经济不再像以前那样孤立发展,而是参与到了世界市场中。进口加出口的量占 GDP 的比率,已从改革前的不到 10%上升到 1985 年的 22.9%、1995 年的 38.7%、2005 年的 63.9%。这一水平远高于其他人口大国(Compendium, 2005; Yearbook, 2006)。中国也已经成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市场的一个主要参与者,在 2004—2006 年,中国平均每年吸收 700 亿美元的外资,对海外的直接投资量也在快速上升(2006 年为 161 亿美元)(Investment Surges, 2007; UNCTAD, 2007)。

中国经济的发展依赖于一系列逐步的、渐进的转变。农村大批人口流失,使农村的就业率从占总就业率的 69%下滑到 32%,农业产出占整个 GDP 的份额也下滑到以前的一半多。

计划经济逐渐淡出,将控制权让位于市场。以前掌握在政府手中的价格,现在已能反映商品的供求变化。2000—2003 年数据显示 87%的商品都是由市场定价(与价

格由政府规定和指导相反),农产品和消费品由市场定价的比重占到 90%(Li, 2006, pp. 104—106)。

改革开放的 20 多年来,商品、劳动力和原材料市场发展完善,竞争力不断增强。虽然投资决策、资本市场和所有权的转让仍旧带有政府偏好的痕迹,但市场总的影响力在继续加深。

尽管政府仍控制着金融、电信、钢铁、石油、烟草和其他重要的经济部门,但民营企业继续进军以前由国有企业掌控的部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估测表明,改革之初几乎不存在民营企业,而它的产值在 2003 年中国的 GDP 中却占到 59.2%(OECD, 2005, p. 125)。

这些从贫穷到逐步富裕、从农村到城市、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公有制到公有制主导的混合所有制、从孤立到融入全球经济的重大转变,形成了全书的背景。本书旨在从一个综合的视角观察这些重大事件。在召集和引导本书的作者时,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具有长远意义的基本问题上。中国经济为何、怎样从计划时期的温和增长(大概在 1952—1978 年间)一跃到急剧发展的新道路上?一旦开始,这种新的高速发展将怎样保持下去?快速发展又是怎样扩展到不同的部门和地区的?具体的部门和地区又是怎样促进这一发展的?正在改变的政策结构是怎样加速或阻止中国经济的?哪些因素限制了中国当前和今后的发展?接下来的章节会从不同角度涉及这些问题和更多其他问题。这一章将为我们提供一个分析框架,来考察 1949 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

背景知识:中国改革前的经济状况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经历了适度而有意义的发展(Brandt, 1989; Rawski, 1989)。二战前经济发展的模式反映出中国向国际商业和投资的开放性。战前经济扩展集中在两个发展极点:一个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新兴的国内外私营企业推动了地方的发展;另一个是东北三省,在这里,国外的资金、科技和专业知识直接通过官方融入中国经济,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预示着 20 世纪 50 年代计划经济的发展。

到 20 世纪 30 年代,经过之前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经济已经发展成覆盖工业、通信、交通、银行业和金融业的现代经济,这些产业中国家所有权占主导。虽然新兴的

现代产业从未占到 GDP 的 1/10 以上,但它的快速发展连同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经济,对农业和其他产业起到催化作用,推动了经济发展,使人均 GDP 温和上涨(Rawski, 1989)。美国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几乎使全世界贸易崩溃,而在这之前,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以及外贸额在 GDP 中的比率,是之后 60 年都未曾达到的水平(Lardy, 1994)。鉴于当时中国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有限,这些成绩就更加显著。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由于遭到战争和通货膨胀的重创,发展潜力微乎其微。政府成功运用了规范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抑制了通货膨胀,恢复了财政平衡和货币经济,促进了经济快速复苏(Perkins, 1966)。

中国政府开始仿效苏联经验创建经济体制。苏联顾问和由苏联培训的专家围绕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着手设立新的机构,集中控制价格,平衡物资,下发具体指令,控制主要进口产品、商品和金融流量的分配。在苏联,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国内储备,尤其是通过从农村提取资源,并将这些资源输送到工业部门以促进其发展。

中国的经济体制并不完全照搬苏联。1958 年,农村居民集中起来,组成大规模的集体,也就是“人民公社”。此外,对工业的管理也不像苏联那样集中,还是把相当一部分权力赋予了省和地方的计划部门(Wong, 1986)。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同,中国的计划机构的行为还是带有苏联经济模式的特点。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开始了经济改革,在之前的 20 多年中,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了利弊参半的结果(Howe, 1978; Riskin, 1987; Naughton, 1995)。虽然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大跃进”和 60 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引起了短期的混乱,但不断上升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还是促进了经济增长。据世界银行预测,1950—1975 年实行计划经济的这段时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 4.2 个百分点。在 77 个非工业化国家中只有 10 个超过了这个数字,而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石油出口国。在这些年间,中国的计划经济表现突出,明显超出其他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这些国家包括巴西、埃及、印尼和墨西哥(Morawetz, 1978, pp. 19—21)。

之后,中国引进了如卡车制造、发电厂和通信设备的生产,以及其他新产业。此外,1959—1961 年中国出现“三年自然灾害”,经济低迷,这就迫切需要重组经济,为此而付出的努力就体现出了新老中国企业的新技术能力(Rawski, 1975, 1980)。

中国的计划体制还对人力资本的创造大有裨益。死亡率,尤其新生儿和母亲的死亡率有所下降;入学率和受教育程度在提高。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从 1950 年的 42.2 岁(45.6 岁),增加到 1982 年的 66.4 岁(69.4 岁),增加了 50% 多。各个阶段的入学率都有提高;教育的普及使在 1952 年到 1978 年间、年龄在 16—65 岁间、未完成小学学业的人口比例从 74% 减少到 40%。

与这些巨大成就同时发生的是一些失误,最明显的失误体现在食物供给上。到1961年,粮食供给不足的现象仍未结束:直到改革之初,农村人均营养水平一直低于基本营养标准。

虽然1957年后,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并未改善,消费商品的种类并未增加,但他们享有更好的物质条件。他们要比农村居民享有更大的粮食配给量;享有特别的由政府资助的受教育机会、医疗卫生、住房和退休金。城乡收入差距显著,城市居民享有更好的生活条件,这就迫使政府通过重新执行中国传统的户籍政策,严格控制粮食、城市住房和其他消费必需品的分配,以减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

尽管产量增加了,苏联模式的集中计划还是造成了生产的低效:强调产品数量,却以牺牲质量和种类为代价;集中生产投资品而不是消费品;忽略创新和消费者的需求;过多的垂直整合;计划引起了产量和投资的季节性波动和大量的囤积储货(Rawski, 1980)。

服务业的落后使这一状况更加恶化。到计划经济结束时,由于受教育不同而形成的工资差异基本不存在。一项研究表明,服务业的平均收入水平超出了高等知识分子的收入(Hou, 1999, pp. 184—185)。

中国的经济孤立于国际经济,加大了所取得的成就和发展潜力间的差距。中国政府的保守作风,再加上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对中国实施部分贸易禁令,限制了中国进入全球市场(Eckstein, 1966; Lardy, 1994)。这不仅剥夺了中国商品生产者获知重要经济信息的权利,而且中国企业也无法了解和适应国际竞争的原则和激励,致使国内生产偏离有利的方向。政府对国内外专业化生产的限制加大了对产量和生产率增长的壁垒(Donnithorne, 1972; Lardy, 1983)。

1952—1978年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了这些弊端产生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得益于一系列有利条件:技术的改善,受教育程度的不断上升,低通货膨胀,还有国内稳定的政局。虽然这些因素中任何一个都应该能提高生产率,但现有数据却表明在计划经济时期,并没有多要素生产力上升的趋势(多要素生产力指单位加总的资本和劳动的产量,这里的劳动指由于劳动者受教育而有所改善的劳动)。事实上,生产率可能已经在下滑,这也有助于调和20世纪60至70年代间未能上升的投资率,从而促进GDP增长(Field, 1983; Ishikawa, 1983)。

20多年的计划经济使中国经济遭遇了低效发展。城乡之间市场分离,跨行政区域的经济流通受到阻碍,农业和非农业之间、个人和集体部分之间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在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上的差异,全都表明可能存在对资源大范围的错误流向现象,这是静态低效率的明显迹象。中国经济还遭遇了现实和潜在产量之间

持续存在的巨大的差距,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x 低效率”。广泛存在的对工作的懈怠情绪限制了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计划者通常把结果分为令人满意的和不满的两类。对为改进生产而要付出代价和经受风险的生产者而言,由于他们没有对在产品质量、种类、生产消耗或生产率方面的改进给予特别的认同和奖励,因此在这些方面的进步得不到他们的任何补偿。没有政府领导的直接干预,人们把创新搁置在一旁,一味追求短期的物质产出(完成计划)。社会生产边界的扩展落后于已有知识和资源体现出的潜力,结果造成了动态的低效率。这种结果在单个公司中随处可见。作为中国首个制造商之一的“一汽”,在 30 年的停滞不前(Li, 1993, p. 83)后发现自己的设备和模具早应被淘汰,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宏观经济层面。

我们发现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停滞和低效的三个深层次原因:非经济的政策目标、制度的薄弱和激励刺激的缺乏。

虽然中国政府重视物质进步,但在计划经济时期,对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的考虑经常超过对经济的考虑,这无疑对产量和生产率有消极的影响。

计划体制忽视创业精神,强制实行统一一致的做法,使企业的僵化作风充斥到整个经济发展中。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如果公司在 11 月没能得到维修服务,企业家就会减少差距来寻求利润。但在计划经济下,政府会指定投资款用于具体项目,在政府研究所集中进行研究活动(在中国能给生产运行提供即时支持的应用研究通常会被忽视),而不给企业提供及时反应的机会。同样的阻碍也困扰着现存企业中的革新。由于缺乏高水平的支持,公司管理人很难解释研发新产品带来的正常花销,只能耽搁,甚至最后导致失败。

激励机制的缺乏更加剧了这些困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和企业通过满足新老客户的需求超过对手,来扩大销售和改善财务绩效。在计划体系下,行政命令控制着销售量和销售方向,生产者既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来扩大销售,也不会面临竞争对手超越自己的威胁。因此,计划体制没有产生自发而分散的压力,迫使企业像在市场经济下那样改进生产和销售。

70 年代末,计划经济没有解决长期的粮食供给问题。20 世纪 70 年代的前半段,粮食配给不足的家庭数量不断上升,粮食储存和跨省粮食运输减少,所有这些针对濒临粮食严重危机的边缘的体制,并且没有持续改善的迹象(Zhao, 1988, pp. 144—147)。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并不令人吃惊。改革的主要机制是恢复农村包产到户的做法——这从 60 年代开始被证明是一大成绩(Pei, 2006, p. 31)。